

# 同盟与分歧的开启

## ——米高扬密访西柏坡对中苏新关系的影响

饶品良

**内容提要** 1949年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密访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长达8天共12次会谈,双方就即将成立的中共新政权的政体、经济等众多问题进行了商谈,为中苏新同盟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但与此同时,两党间的一些历史和意识形态问题却没能及时得到化解,成为日后中苏关系的隐患,导致中苏关系的分歧与恶化。

**关键词** 中苏关系 米高扬 中苏同盟 中苏分歧

饶品良,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510620

1949年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双方就中共党史、中共新政权的政体、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使苏共领导人对中共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和认识,为中苏新同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sup>[1]</sup>;但中苏两党在两国历史、两党意识形态等一些问题没能得到及时的化解,这些问题成为中苏同盟分歧与破裂的隐患。

### 一、米高扬密访西柏坡的背景

1948年底,中共军事行动发展迅猛,夺取全国胜利指日可待。12月30日,毛泽东特意为新华社撰写《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sup>[2]</sup>。随后,心情大好的毛泽东尊称斯大林爱听的称号——“大老板”,向斯大林陈述了自己的访苏计划:“等两个大战役阶段结束之后,我就到莫斯科去。”并设想1949年春召开中共中央二中全会,在会议结束之后就动身到莫斯科。1949年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毛泽东马上致电斯大林:“我准备到您那里去。为了

[1]相关的研究参见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的再讨论(之二)》,〔北京〕《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俄〕安·列多夫斯基、李玉贞:《1949年:毛泽东与米高扬密访》,〔福州〕《领导文萃》2014年第8期。

[2]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人民日报》,1949年1月1日第1版。

缩短时间,我希望您派两架飞机到石家庄,最好是四引擎的。来石家庄的飞机可以在18、19、20日中任何一天到达。”次日,中共胜利结束了淮海战役,毛泽东兴奋地把战况简要地电告斯大林,并再次提出访苏要求:“现在我们急需前往您处。向您——我们的大老板和联共(布)中央汇报,并听取您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指示。”<sup>[1]</sup>

然而,斯大林却在10日电复毛泽东:南京国民政府希望美、英、法、苏四国政府充当国共停战调停人,征求中共方面对调停的意见,提议毛泽东的访苏日期再推迟一些时日。次日,斯大林把南京国民政府关于调停问题的备忘录原件转交给毛泽东,同时解释苏联对调停问题的答复,“其用意在于阻止和平谈判”<sup>[2]</sup>。不过无论斯大林作何解释,在中共的全国胜利指日可待之际,斯大林的电报是相当不合时宜的。据师哲回忆,当时,中共中央五位书记传阅了斯大林转来的国民政府调停信后,都没有表态,甚至也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周恩来看完信后说了一句:一看这信,便知是王世杰的手笔,文绉绉的。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sup>[3]</sup>。很明显,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斯大林的做法都十分不满,只是当时不便发作,只能强压怒火而已<sup>[4]</sup>。1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客气但又坚决地拒绝斯大林的与国民党谈判建议。随后,毛泽东又对身边的苏联军医捷列宾(实则是苏联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表示:反对各种形式的调停,反对中共参加任何形式的国共谈判;并表示自己的访苏之行如不能在1月底前成行的话,那自己就无法去莫斯科了<sup>[5]</sup>。婉转表达对斯大林的不满。

为平息毛泽东的不满,斯大林召开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毛泽东的访苏问题。据米高扬后来回忆:在1949年1月14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对毛泽东访苏一事说出了自己的考虑:毛泽东在当时的环境下访苏是不可能做到保密的,他的访苏会被西方说成是谒见莫斯科,从苏共那里讨取指令,他本人会被讥讽为莫斯科的走狗。这会损害中共名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会以此反对中国共产党人。而且,毛泽东领导的正式中国革命政府即将建立,那时毛泽东以正式的中国政府首脑来访,反而会提高中国革命政府的威望;至于毛泽东需要与苏联领导人当面讨论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派苏联中央政治局的一名委员前去中国商谈。苏共政治局同意了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提议米高扬担任此任务,并指令毛泽东身边的两名苏联军医捷列宾和梅利尼科夫负责米高扬和莫斯科的通讯任务;斯大林还命令米高扬去中国用的是安德烈耶夫这个化名,签署发给菲利波夫(斯大林化名)的电报也用这个姓,以防万一泄露出苏联政治局代表在中共中央驻地的消息<sup>[6]</sup>。可见斯大林对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是相当谨慎的。

1月14日,斯大林把推迟毛泽东访苏计划、改派一位苏共政治局委员到中共解放区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面谈的决定通知毛泽东。由于毛泽东的访苏计划遭到斯大林的数番拒绝,毛泽东的访苏意愿已大为减弱,所以,接获斯大林派遣米高扬密访西柏坡的决定后,17日,毛泽东即致电斯大林:同意暂时推迟访苏,欢迎斯大林派政治局委员到中国来,并提议苏联代表先到达石家庄,然后再到中共中央驻地最为合适,在那里他可以就一系列有关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与中共中央书记处5位同志进行交谈;最好是在1月底或2月初来<sup>[7]</sup>。因为毛泽东估计到那时,北平和谈胜

[1]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329—331页、第341页、第345页。

[2][5][7]《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346—348页,第349—350页、第352页,第354页、第359—360页。

[3]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修订本),[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267页。

[4]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室1994年版,第324页。

[6]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九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220—223页。

券在握,西柏坡肯定处于绝对的安全状态,比较适宜举行中苏两党高层的秘密会谈,中国共产党人更能以中国未来政权执掌者的姿态与苏共代表开展会谈。

然而,23日斯大林突然通知毛泽东:联共(布)中央代表将在10天内抵达你们所指定的城市。26日,联共(布)代表米高扬一行从莫斯科飞往中国,28日抵达大连,斯大林才把米高扬的行程和化名告知毛泽东,并要求对米高扬到访一事保密。毛泽东闻讯即复电斯大林,希望米高扬于2月2日至5日抵达石家庄,因为有一个民主党派代表团将在2月1日前离开石家庄,毛泽东是设想以此掩护米高扬的到访。然而斯大林却电告毛泽东:米高扬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将于1月29日或30日抵达中共中央驻地。毛泽东只好回复斯大林:同意苏共代表在1月29日或30日到来,委派朱德和任弼时迎接他<sup>[1]</sup>。任弼时随即紧急通知聂荣臻:准备好石家庄飞机场<sup>[2]</sup>。

30日米高扬一行乘飞机到达石家庄附近的机场,受到朱德、任弼时和师哲的迎接,随后,经过6小时的车程抵达西柏坡<sup>[3]</sup>。虽然米高扬密访西柏坡是斯大林出于考虑平息毛泽东不能访苏的不满,安排米高扬的行程时也没有听从毛泽东的建议,然而在此之前,斯大林还从来没有派政治局委员到任何共产党打内战的国家去过,更不用说当时的中国国民党与苏联还有外交关系,因此,斯大林其实是相当看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他对中共的关心和支持也是真诚的<sup>[4]</sup>。

## 二、中苏两党高层会谈与中苏新同盟的开端

30日午后,米高扬和随员И.科瓦廖夫(苏联铁道部副部长,时任中国长春铁路苏方负责人)、E.科瓦廖夫(汉学家,担任米高扬翻译)及其警卫员一行抵达西柏坡,毛泽东在会客室接见了他们,并把他们介绍给周恩来等其他几位书记。接着,毛泽东话中有话地说:“中央书记处由在座的五位政治局委员组成,除了他一个人之外,其余各位同志都在不同时期到过苏联。”<sup>[5]</sup>言外之意是抱怨斯大林数次拒绝自己访苏。米高扬只能置若罔闻,在尴尬中转达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呈上斯大林赠送毛泽东的礼品——一块毛料;介绍自己的来意,解释了斯大林不主张毛泽东近期访苏的原因。在交谈中,由于苏方翻译E.科瓦廖夫的中文口语不行,更听不懂毛泽东讲的湖南口音,最后只好由师哲担任会谈中的全部翻译工作<sup>[6]</sup>。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8天里,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12次正式会谈。中共领导人详细而全面地介绍了中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以及中共正在或即将实行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和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苏两党第一次高级别的成功会谈,中苏两党高层经过直接的交谈和接触,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使苏共领导人对中共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和认识。米高扬结束与毛泽东的会谈后,在和师哲的私下闲谈中,坦言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虽然这可能是米高扬的客套话,毕竟毛泽东的农民革命家形象在苏共领导人头脑中是根深蒂固,不大可能经过两三天的谈话就得以消除。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次会谈,苏共领导人长期形成的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偏见是有一定的改观。2月4日下午,双方在会谈间隙时,米高扬又表示:任弼时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觉得任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

[1][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361页、第364-365页,366页。

[2]《聂荣臻元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537页。

[4]伍修权:《伍修权将军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

[5]师哲回忆米高扬抵达西柏坡的时间是31日午后,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的是30日,师哲的回忆有可能因年事久远出现讹误,故本文采用俄罗斯档案显示的日期。《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366页。

[6]《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修订本),第272页。

领导者,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这说明,你们党的领导是坚强的,中共党内人才济济,这是取得胜利的第一个保证。在离开西柏坡前夕,米高扬又对师哲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sup>[1]</sup>

2月8日凌晨,米高扬由朱德、任弼时陪同抵达石家庄,乘车游览了市容后登机回国。送走米高扬后,朱德、任弼时重入石家庄市约见市长柯庆施,柯庆施才明白刚刚听到的飞机轰鸣声和几天前也曾听到的一样,才恍然大悟<sup>[2]</sup>。中共保密工作之严格与高效给米高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情况也很快为斯大林获悉。所以,当米高扬回到苏联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斯大林的秘书即打来电话,对米高扬在中国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要求米高扬尽快回莫斯科作详细汇报。米高扬回到莫斯科后,斯大林和苏共政治局委员都对米高扬的秘密访华感到满意,认为米高扬很好地完成了使命<sup>[3]</sup>。而中共经过与苏共的高层交流,尽管斯大林对毛泽东个人仍有怀疑,但毕竟承认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并尽力加强他的权力威信,以便起到莫斯科分配给他的亚洲革命首脑的作用。也由于这个原因,米高扬访华期间没有任何对王明的议论,这也意味着斯大林认可了毛泽东对王明路线的清算<sup>[4]</sup>。中苏两党取得的这些共识,坚定了中共“一边倒”的对苏政策,成为中共新政权成立后,开启中苏新同盟的重要政治基础。

#### 四、米高扬密访时的中苏两党分歧与误会

虽然米高扬密访西柏坡加深了中苏两党的相互了解,然而,由于斯大林更多是站在苏联利益来考虑中苏两党关系,所以米高扬密访西柏坡期间还是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分歧,影响了中苏两党日后的关系。

##### 1. 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南迁

随着中国内战的明朗化,国民政府大势已去。1月,国民政府谋划南迁广州,并知会各国驻华大使馆一同南迁,英美等西方国家均不予理睬。可是,在米高扬抵达西柏坡的次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竟然随败退的国民政府南迁广州,苏联此举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强烈不满,毛泽东借故没有出席2月1日和2日与米高扬的会谈;3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渡江的指示<sup>[5]</sup>。当米高扬走后,2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对同南京代表团谈判的指示》,对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严厉的谈判条件,迫使国民党自动停止谈判<sup>[6]</sup>;次日,中共又迅速调兵遣将、发布命令:“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sup>[7]</sup>为争取全国胜利作好准备。接着,毛泽东接连撰写了《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等文章<sup>[8]</sup>。中共此举既

[1]《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修订本),第279-281页。

[2]师哲的回忆是2月7日,但俄罗斯档案及米高扬在1960年的报告都陈述2月7日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因此,师哲应是记错了日期。《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修订本),第281页。

[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九卷),第227-228页。

[4][俄]亚·弗·卢金:《俄国熊看中国龙——17-20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刘卓星、赵永穆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页。

[5]《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6]《中央对同南京代表团谈判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7]《中央军委关于同意三月底渡江作战计划等问题的指示》,《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六册),第118页。

[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1313页。

戳破国民党和谈的幻想,也表达对苏联的不满。

虽然斯大林向中共解释苏联驻华使馆随国民政府南迁“是为了侦察,以便他(罗申)可以经常向我们报告长江以南局势的情况,以及国民党上层及其美国主子的情况。这对我们和你们来说都是有益的”。斯大林还表示:“我们欢迎中共对所有在华的国外间谍机构和领事机构,对文化、医疗、电报、广播、报纸及其他机构采取的施加压力的政策。为此我们愿意取消苏联在华的各类机构。”<sup>[1]</sup>可见,斯大林也知道自己的解释相当牵强的,很难以让人信服,因为侦察有很多手段,大可不必把体现对政府权力承认的大使馆一同南迁,苏联此举无疑为中苏两党关系蒙上一层不悦的阴影。

## 2. 李敦白事件

在斯大林与毛泽东商谈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电报往来间,美国首先发表声明不参与国共调停。这让斯大林非常恼火,他认为中共泄密了,于是批评中共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好:美国搞的和谈花招是不符合我们意愿的,但遗憾的是这个花招出现了<sup>[2]</sup>。1月28日,遵照斯大林命令的米高扬秘密到中共中央的驻地西柏坡进行访问。米高扬在乘车前往西柏坡途中,一路上几次下车在沿途的村镇中访问农民,毫不掩饰地暴露自己,还自负地认为:“在你们这里哪能做到保密?!”没几天西方媒体就会把苏联人抵达西柏坡的消息披告全世界。然而,事实与米高扬的预测恰恰相反,为此,米高扬在1950年初专门就此事向师哲道歉。师哲认为米高扬不只是一般不了解中国,而且更不了解中国的漫长历史、古老文化、中国劳动人民的高尚品德和政治觉悟水平<sup>[3]</sup>。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主观地认为中共中央的保密工作很差,所以,毛泽东后来生气地说:斯大林等苏共人员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做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sup>[4]</sup>。

在会谈中,米高扬秉承斯大林旨意地对毛泽东说,苏联知道,英、美、法等国曾同意担当国共谈判的调停人,后来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得知苏联和中共都反对外国调停,这些大国也就放弃了调停,“因此,必须认真做好保密工作,必须明白,在中共周围是否有一些多嘴多舌的人,通过他们,这一信息会被美国人知道”。毛泽东对此断然否认,他解释说,如此大的问题,包括同莫斯科的通信,通常只有在座的五位中央委员、翻译师哲和捷列宾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靠的,他不会怀疑他们。据他所知,英美在得知中苏两党的态度之前就公开表示,苏联和中共反对调停。米高扬说,这可能只是他们的假设,但是,西方大国在得到了关于我们的立场的可靠情报之后,就匆忙放弃了调停。毛泽东于是说,不排除一种可能,消息是从中共周围的人透露出去的。当米高扬确认中共中央机关里有位名叫李敦白的美国人,而且李敦白是美国记者斯特里的学生兼同事,两人正一起合作撰写、著述颂扬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路线以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这让斯大林担心毛泽东成为铁托第二,脱离苏联的控制,于是,斯大林立刻命令米高扬向毛泽东通报:“我们毫不怀疑,在中共中央机关编辑部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是一个阴险的美国间谍,我们建议立刻逮捕他,通过他来揭露美国的间谍网。我们非常确信,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一名美国间谍,近年她多次请求到苏联来,好像是工人运动中的左翼分子和同情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每次都拒绝了她。事实上她早就在为美国人服务了,是他们的间谍。我们建议今后不要与她接近,不允许她到中共占领的地区”。随后,米高扬立刻把毛泽东等人的反应向斯大林汇报,并表示:实际上他们(中共)会怎么做,我在离开前会了解并向您报告<sup>[5]</sup>。虽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不相信斯特朗和李敦白是间谍,可是在斯大林的蛮横强令下,只好逮捕了李敦

[1][2][5]《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394页,第354页,第410页、第418页、第440页。

[3]《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修订本),第270-271页。

[4]《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324页。

白,违心地制造了这一起冤案,直至斯大林去世才为李敦白平反<sup>[1]</sup>。

### 3. 斯大林对中共性质的怀疑

1948年之后,中国革命形势逐渐明朗,可是,斯大林却延续了对中共的不信任,尤其南斯拉夫事件发生后,当时有许多议论,说中共走上了南斯拉夫道路,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增添了斯大林对中共的不信任。这迫使毛泽东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竭力向苏联示好,主动向米高扬询问:南斯拉夫是否妨碍欧洲的共产主义工作?并特意表示:铁托就是张国焘,张国焘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叛徒。毛泽东还多次在会谈中强调,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坚持亲苏的方针;在谈到自己1945年所写的关于中国革命基本方向的小册子的时候,毛泽东又借机说在斯大林的信能找到“撤退是合理的进攻”的指示,使他非常高兴,他马上把斯大林的信在广播中播出,在各部队中对其进行研究<sup>[2]</sup>。显然,毛泽东是希望在米高扬面前主动批评南斯拉夫,向斯大林表明自己不会成为铁托式的人物,表明中共亲苏的坚定立场和信念,消除斯大林对自己的怀疑和顾虑。

不过,毛泽东的努力没有奏效,米高扬在向斯大林的汇报中认为毛泽东是故意贬低自己作为中共的领导和理论家的作用和意义,“这是东方人表示谦虚的一种方式,并不代表毛的本意和他对自己的认识”<sup>[3]</sup>。对毛泽东不放心的斯大林随即逮捕了在欧洲宣扬中共斗争经验的美国记者斯特朗,接着又勒令中共制造李敦白冤案,以此毁掉斯特朗在世界各地共产党中的声誉,特别是那些原已同意出版斯特朗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的欧洲国家<sup>[4]</sup>。斯大林的专横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相当不悦,只是囿于当时的国际情形不便发作。后来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坦言:“我相信,(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当我们的革命取得胜利后,斯大林怀疑它的性质,他认为中国是另外一个南斯拉夫。”<sup>[5]</sup>

### 4. 新疆问题

在苏联的策划下,中国的新疆在20世纪20—40年代成为苏联的实际控制地区,时任斯大林的私人翻译曾感到万分惊讶:为何中国的新疆省在苏联外交部的登记册上被单独列项,并且归苏联外交人民副委员杰卡诺佐夫负责,使中国的这个省成为苏联事实上控制的一个地区,新疆的督办盛世才曾多次携家人到苏联治病和度假,多次拜见斯大林。有一次,盛世才甚至请求斯大林接受他为联共(布)党员。斯大林慷慨地说:“您可以认为自己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党员,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目前不宜谈这件事。”于是,盛世才真的把自己看做苏联的人,以绝对服从的方式执行了莫斯科的指示,将这个富饶地区的自然资源交给苏联使用。这个交易当时属于高度机密。直至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与盛世才的关系开始恶化<sup>[6]</sup>。

1942年底盛世才在新疆实行反苏反共政策,宣布新疆重归国民政府领导,国民政府军队也进驻哈密,心有不甘的苏联于1943年发动新疆三区革命事件,试图重新恢复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因此新疆问题是当时中苏关系的一个敏感问题。2月3日,毛泽东提前一天通知米高扬:想跟他讨论新疆问题。4日,毛泽东开门见山说,隶属于乌鲁木齐政府的新疆伊犁州在进行独立运动,那里有共产党。很显然,这里的共产党实质就是指苏联。米高扬当即否认毛泽东的疑问,并声明苏联不支持新疆部落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苏联政府“认为新疆是,而且应该是中国的组成部分”。但这并未打消毛

[1]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65—76页。

[2]《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206页、第410页、第431页。

[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九卷),第226—227页。

[4]《斯特朗文集》(2),[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403—404页。

[5]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八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135页。

[6][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薛福岐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页。

泽东的疑虑,毛泽东又借口白崇禧曾提及:在伊犁州的暴动者拥有苏联生产的大炮、坦克和飞机。随后毛泽东又描述中共对新疆的规划:让新疆像内蒙一样完全自治,通过新疆建造连接中国和苏联的铁路,加强中苏联系。任弼时接着提出:为什么不建设连接乌兰巴托和张家口的铁路?此段距离不长,对连接华北有很大意义。由于事关重大,米高扬不敢马上作答<sup>[1]</sup>。不过苏联确实是考虑到苏联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民族因素,以及英美等国对新疆的觊觎,因此在新疆问题上,斯大林除坚持保留苏联在新疆的一些商业利益(主要是以苏联入股的合资公司的形式),在主权方面开始作出退让,停止了对主张新疆脱离中国而独立的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首领们的支持。后来斯大林主动劝告毛泽东占领并严格控制新疆和西藏<sup>[2]</sup>。1949年下半年,苏联在中共进军新疆时提供了很大的援助和支持。尽管如此,可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还是十分怀疑苏联对新疆的意图,毛泽东后来就直言不讳地批评斯大林在中国犯的错误很多:“他占领了旅大,把新疆和东北变成了半殖民地,而且还建立了4个合营公司。这些都是他干的好事。”<sup>[3]</sup>

### 5. 外蒙古问题

外蒙古在中国抗战胜利后宣布独立,造成中国人民复杂的心情。因此,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借讨论民族问题的时候试探地问道: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合并,在中共政权更稳固时,重新加入中国。结果当即遭到米高扬的坚决拒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外蒙古早已独立。”米高扬随即向斯大林汇报了会谈记录,斯大林立刻复电米高扬,由米高扬转达毛泽东:外蒙古的领导人赞成中国所有蒙古地区与外蒙古联合,但是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米高扬还特意强调说:苏联并不认为外蒙古为了中国某个组成部分的自治会放弃自己的独立。毛泽东见状只好说:我们尊重外蒙古想成为主权国家的愿望,如果它不愿意与内蒙古联合,会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也不会反对。毛泽东还补充说,我们不赞成大汉族主义政策<sup>[4]</sup>。很明显,毛泽东知道了维系外蒙古独立是苏联不可更改的目标,毛泽东只好放弃了对外蒙古的领土要求。然而,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始终难以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完全释怀,中共建立新政权后,毛泽东、周恩来等曾数次对苏联婉转提及外蒙问题,但毫无例外遭到斯大林、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再次坚决拒绝<sup>[5]</sup>,外蒙古问题也由此成为中苏新同盟的一处微妙瑕疵。

米高扬密访西柏坡期间发生的这些误会与不快,部分原因是中苏两国历史积留下来的问题,但更深层原因则是斯大林出于大国沙文主义情结,一切以苏联利益为出发点和终结点,有意或无意地做出伤害他国利益的事情。这些问题在中苏两党步入蜜月期之初被暂时掩盖了,但是,却成为中苏关系的隐患。后来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把这一切历史的积怨与不满发泄在米高扬身上,他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我们对米高扬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sup>[6]</sup>斯大林的继任者又没有很好解决这些问题,致使斯大林对中共性质的怀疑与不信任延续下去,成为后来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的内在原因之一,并引发了中苏关系的恶化。

[责任编辑:肖波]

[1][4]《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421-422页,第442页。

[2]《俄国熊看中国龙——17-20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第206页。

[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八卷),第134页。

[5][俄]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9页;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3页。

[6]《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4页。